

徐迟的四首佚诗与四封书信

□国杰 张元珂

徐迟是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迟研究离不开新材料的支撑,为此,我们提供了一组最新资料,以供读者参考。

四首佚诗:“二十岁人”的哀怨与忧伤

悲爱

这全是我,青春的低气压,审美线,春天的阵势,然后是悲爱。

到咖啡馆之路

为浓的咖啡而存在的,鲸鱼的黑影底黑暗之路。/枫掌铺在到咖啡馆之路,踏在碎杯形的咖啡色之叶,咖啡馆的花格式的窗子,寒风推送的枫叶。/一条黑色的丽体黑泥的丽体,黑泥的丽体伏着的路。

吊桶

于兹已久的飘流的生涯,我是浮泛在吊桶之中,吊桶是黑色,而且发腐了呢!她在我心上起落,汲取,没有办法时的不安之泪。

楼

楼,楼角的灯,灯光中黄色的风,溶解成忧郁,流进窗子。

陷在思想中,那乱的麻哪,想着芽与叶,想着花,想着果子,想着沃苦的女郎,野火在街上,也炸裂了啊!

《矛盾》创刊于1932年4月,主编有三位:潘子农、汪锡鹏、徐苏灵。《矛盾》发表了李金发、徐迟、戴望舒等现代派诗人的大量诗作。该刊似乎对徐迟偏爱有加,共发表了他的9首诗歌。其中,《寄》《火柴》《夏之茶舞》《春烂了时》《沉重的Bus》在徐迟后来出版的各类文集或选集中都有收入,而《悲爱》《到咖啡馆之路》《吊桶》和《楼》4首却踪影难觅。经我们查阅:只有由原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徐迟研究专集》捎带提及,但仅存标题,未录全文;由作家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十卷本的《徐迟文集》以及此前各类选集均未收此四首诗,故可初步断定其为佚诗。

徐迟在《二十岁人》序言中说:“我这个人是属于感伤的男子的”。这四首诗侧重表达现代都市人莫可名状而又无可排解的现代感伤情绪——青春期的忧郁与迷离、日常生活中的轻愁与苦闷、爱情体验中的悲欢与无可把握——较为充分地呈现了这位“感伤的男子”在上世纪30年代最为本真的心灵样态。

徐迟深受艾略特、庞德等西方现代派诗人影响,尤善于意象抒情,以象征言事,故其30年代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明显的西化色彩,比如:句法欧化;节奏跳跃性大;通感和暗示艺术手法的运用;重幻觉、重想象,尤重一己意识或潜意识的开掘与表达;达意趋于抽象、幽曲乃至晦涩,等等。尽管他一再表达过悔其少作之意,但在今天看来,作为诗人的徐迟恰恰以这些“少作”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最初地位和成就。

在中国新诗语言发展史上,联觉语言是最具先锋性、原创性的语言类型。它不是修辞独立运作的结果,而是语言与联觉(听、视、嗅、味、触,

及内感官或“第六感”)互聚生发的结晶。这种经由李金发较早引进并创生,后经卞之琳、路易士、徐迟等现代派诗人发展了的新诗语言,确证并充分显示了“新诗”这种文体的合法性、自足性、先进性。这四首诗的语言类型是较为典型的联觉语言,颇值珍视。

致王蒙:为“新时期文学”鼓与呼

王蒙同志:

前不久,接连两次给编委会的同志说,最近我不打算写信了。今天上午忽然心血来潮,又想写几句给您了。

第十期全看完了,我喜欢的有100页上的《死的沙柳和活的沙柳》;其次是《紫薇童子》《秋雪湖之恋》和《东方佛雕》,以及《中秋月》;这些都是颇见功力的文章。《男子汉的宣言》也是的,还有《扫帚星》和《多得了五元钱》《填表》《护桥碑》《三兄弟》,全都有点意思。这一期都喜欢,那几篇杂文,我不喜欢,我是说我不喜欢它们的锋芒所向的东西,叹一口气,不知该怎么办?诗一组,都很美。这一期比新编委会成立以来的前两期更好一些。

但是,也该来一个“但是”了,究竟哪一篇是正面描写或侧面描写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技和现代国防的呢?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敝刊过去是发表过的,但这一期没有。我不是说期间都应该有,但每一期都要求有这么一篇两篇,或者编辑部心目中有这么个标准,为此而作一些努力,还是可以的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字是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我希望能看到它们。两三年后让它们多起来,每期都有三五篇。让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进的足踪印迹在敝刊的版面上,可不是非常好吗?

不过,我真的是喜欢那位秋雪湖上的严樟明的,他毕竟到了南海油田的钻井船上。还不是反映到我们能源建设了吗?是的,反映了,但也还是不满足,因为信上说的是要洁白的芦花。他是十一月一日出海的,已经在海上十天了。我等着听他的战报。什么时候打出了油气来,望作者便能告诉我们。

编辑部的同志们辛苦了,请您转告我的致意,并敬礼!

徐迟

1983年11月10日,中午,武汉

这是书信的原稿。

查阅1983年11月24日《人民文学》稿签知,编委会曾对这封信做过初审:

徐信除谈及对刊物的评价外,提出了文学创作直接反映四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此信可放在编委会信箱一发。从当前创作状况考虑,杂文作者面临很大困难,气可鼓,不可泄。另,对本刊已发杂文反映不一,各有看法。此情况下,有关批评杂文的话,删去为好。否则,杂文作者会感到无所措手足。以编委身份讲意见,持慎重态度较宜,如何,请复决。

24/11

王蒙完全同意初审编辑的意见,于是,在将“王蒙同志”改为“编委会”,删除“这一期都喜欢,那几篇杂文,我不喜欢,我是说我不喜欢它们的锋芒所向的东西,叹一口气,不知该怎么办?”和“编辑部的同志们辛苦了”这两处后,以“让反映四化建设的作品多起来”为题,将之发表于《人民文学》1984年第1期上。

徐迟是“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不仅表现在以《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等报告文学作品领跑新时期文学创作,还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始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后者而言,在80年代前半期,他较早提出文学要反映四个现代化的命题,并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字是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就是很好的明证。提出新课题,呼唤新文字(语言),并身体力行地践行之,这在“四化”建设成为1980年代主旋律的整体语境中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正因如此,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决定在该刊“编委会信箱栏”中刊发此信,并采纳徐迟建议,开始重视此类作品的组稿与发表。

徐迟在这封信中的观点对今天的文学创作(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依然具有重大启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构想,在第七部分中专门论述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诸命题。依我们理解,要建设和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开拓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必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而如何开拓,怎样发展,并使表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字成为“最美丽的、最新的文字”,则是一项崭新的、紧迫的、意义深远的伟大课题。

致蹇先艾:

颇显性情,颇见真情

蹇先艾同志:

您好!久违了,也没给你写信;却忘不了在沈阳发酒疯时缠住了你不放,那时就有那么多的话。今天收到了你的书,非常喜欢,写上几句,但也没什么说的。十二月理事会时再来唠叨吧。谢谢你的书,我也寄你一本,不过我的那本差劲儿,不如你的严谨和精采(彩)。读了后记,水葬等好几篇。

此致

怀念

徐迟

十一月二日武昌东湖路十五号乙门二楼一号
“先艾”,即蹇先艾(1906—1994),现代著名



1949年7月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前合影,从右至左:戴望舒、卞之琳、朱维基、王辛笛、臧克家、徐迟、楚图南。

作家,五四时期以写乡土小说著称。短篇小说《水葬》是其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名作。

中国现代文学馆共藏有徐迟致蹇先艾的三封书信。这是其中一封,写信年份不详。在信中,徐迟或表达问候,或回忆往事,或切磋技艺,无拘无束,若拉家常,情真意切。徐、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人艳羡!

“却忘不了在沈阳发酒疯时缠住了你不放,那时就有那么多的话”一句尤见徐迟率真品性。

致曾敏之:尽显赤子之心

敏之兄:

我收到你的10·29的信,得知你们到北京访问的报道,看到《徐迟与江南》的文章,其中“曾有第二春”说得非常好,谢谢!我现在住了医院,东湖之滨,小小散步便可以从家里走到病房。高干病房安静,明亮,一人住一屋。半天打吊针,半天写作。正在写五十年代,已经写完,要写六十年代了。健康没有大问题,高血压不高且已稳定在正常之列,支气管炎引起肺气肿,正治疗着。其他都较好。九月访港是一切都听作协、作联的安排。本有几个建议,且已给你写了一封信。后想想倒是不应该寄出,免得你们临时追加项目,就未寄出。在港时,也有机会提出,忍住了没有提,以执行既定项目较为松弛,更为适宜。回来写文章觉得该提的还是要提(不谈不提了)。主要就是九七的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是大题目,大文章。一个作家能写这个题目,结束将近一百五十年殖民统治的题目,实在是光荣不过的大事。不一定要写书,一篇两万字的报告文学就够我写的了。我那写出而未寄给你的信里,就想到新机场看一看,再谈一

点有关经济投资、收支账目的问题,说明其利弊之所在。不是短期采访可以完成的,就没有提。那天在新华社宴会上,虽坐在张社长旁边,也忍住了不提。怕一提就打乱了预定之程序。而且要访问的项目岂止一个新机场呢。好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长计议。不过,现在也该考虑到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了。可以写这篇文章的人很多,有许多老香港可写。你可准备材料了。但外来的人可有许多新鲜的感觉,也可以写。大家来写,写它几十篇,可以振奋人心,垂眸千春。现在就真该作写的准备了。不要忘了金庸呢!

不过,此事不必公开说出来,更不要成立什么回归文学创作组之类的组织。那就会流入俗套,也出不了好文章。作联应该鼓励创作,关心创作,但创作什么,怎样创作,不要去管,关心一点就会有成果的。关心就能出人才。恕我多言了。

如果我的身体能好起来,我还要作第五度的访问。

明年五六月间,三峡大坝下游还有一座悬索的长江大桥要通车,那时来最好,如我还健康,我可陪你同去,一次看两个大工程。过几天当先打听一下,下次再告诉你具体的大体时间以及设想中的往来安排,好吗?

再次感谢你的热情接待,不知珠海的华夏诗会今天能否开成,当可再见面。届时如能到香港小居,避过冬寒,就是作非分之想了。多言乞谅,并祝近安!

徐迟

95.11.7

1995年11月7日,徐迟于住院期间给友人写了这封信,而一年后的11月25日,他又一次因病住院,不过,这一次他给国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12月13日凌晨12点多,徐迟选择从武汉同济医院高干病房六楼跳楼自杀,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离世及离世方式让国人震惊!死因肯定的是多方面的——比如:孤独感、失落感、黄昏恋失败、病痛折磨、世纪末灾世情绪、自我迷幻(“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等等——但不堪病痛折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尽管他在信中说:“健康没有大问题,高血压不高且已稳定在正常之列,支气管炎引起肺气肿,正治疗着。其他都较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高血压、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各种慢性且无法彻底治愈的疾病肯定让他苦不堪言。然而,真正的现代文人对生与死的理解大都超脱出生理或物理范畴而延伸至永恒的精神空间。这一略显沉重的话题,单靠一句两句似也说不清,在此暂且略过不谈。我们公布这一封信的目的,是想为徐迟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展现徐迟逝世前一年文学活动和精神动态的最新资料。

自新时期以来,文学与大时代的关系始终是徐迟审美观照的重点。无论在前信中强调文学要表现“四化”建设,还是在此信中呼吁曾敏之(曾任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及其同行要为“九七香港回归”写文章,都反映了徐迟扎根生活、时代与人民的创作理想,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平常的赤子之心。只可惜,他来不及或无心等待香港回归这一天的到来,他最终选择从高楼纵身一跃的方式而撒手西归了。

此外,徐迟在信中说“半天打吊针,半天写作。正在写五十年代,已经写完,要写六十年代了”,那么,他正在写什么?我们知道,徐迟在1995年这一年开始写作《江南小镇》续集,部分章节于第二年6月在《江南》发表,那么,他写的是这方面的内容吗?

(国杰单位:临沂职业学院,张元珂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徐迟文库”中,有一封1978年9月15日常书鸿致徐迟的毛笔信。全信从右向左竖排书写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稿纸上,共两页。

首先,常书鸿在信中对徐迟表示了真挚的感谢:“接你自乌鲁木齐返京后的信,知道你答应为《敦煌艺术》电影说明辞帮忙,这是我们所最快慰的。”不久前,徐迟刚刚前往新疆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采风活动,最后他与曹禹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大会堂还参加了一场一千多人的大型文学活动,并作了发言。信中所说“《敦煌艺术》电影”,指的是1978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一部全面介绍敦煌历史、现存遗迹及敦煌艺术的彩色科学教育片。这一年,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视察敦煌莫高窟时,曾当面向常书鸿提出要加大对敦煌的开放和宣传力度,尤其要在宣传方面多下功夫。常书鸿于是在他与新闻电影制片厂何钟莘同志1962年合写的电影剧本《敦煌曲》的基础上,带领敦煌文物研究所积极整理莫高窟现存资料,并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联系,希望共同合作对莫高窟进行保护性拍摄,为以后的艺术研究与保护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最终,该片决定以敦煌第45窟为主要拍摄地,聘请杜生华担任编剧、郭德明担任摄影、赵

兵负责旁白解说。为了让该片解说词精练、艺术、引人入胜,常书鸿提出邀请老友徐迟帮忙润色语言。常老知道以徐迟的文学才华、艺术造诣和他对敦煌莫高窟历史的了解,他一定能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更好地了解远在戈壁深处神秘的敦煌莫高窟艺术。该提议得到大家认可后,常书鸿立即致信徐迟发出邀请。当徐迟回京看到邀请信后,很快回复信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随后,常书鸿在信中向徐迟谈起了《祁连山下》这部作品对自己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为你的《祁连山下》使我有机会上‘祁连’出‘祁连’飞‘祁连’,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历程,是你,亲爱的诗人!使我有机会回顾和咀嚼人的意义!历史的现实!”《祁连山下》是徐迟1956年10月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它讲述了以常书鸿为原型的主人公“尚达”,为了拯救濒于毁灭境地的敦煌艺术宝库,毅然回国来到孤烟大漠深处进行保护和修复工作。虽历经各种艰辛、磨难,但尚达依然虔诚地守护着莫高窟的故事。徐迟将画家尚达的抱负、爱情、献身艺术的精神作为了他的抒情主题,并以自己特有的诗人激情与想象,将诗歌引入叙述,使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不仅可以领略敦煌的历史、绘画、音乐与地质,还能吟诵那些属于尚达和敦煌的诗篇。该报告文学一经发表,便在60年代的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常书鸿也成为了当时广大读者谈论的焦点。常书鸿没想到一部作品竟能让自己的声望与影响,让远居荒漠的莫高窟得到全社会如此的高度关注。这部作品让常书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让他切身感受到文学对于莫高窟宣传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让我们有一天能跨上红鬃马并驾在‘戈壁滩’上,追踩蜃楼的霞光,那有若无是若非的宿世的迷宫。”这是常书鸿接下来在信中向徐迟发出的一个充满挑战与梦幻的邀请。一向温文尔雅、沉默内向的常书鸿为何向老友徐迟提出如此美丽的设想?已进古稀之年的书鸿老人,他的内心充满着怎样的喜悦与激情?1978年对常老而言,是值得庆

祝的一年,这一年,常老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前往首都北京参加了人大会议。妻子李承仙也终于在“文革”结束一年多后,得到平反,其组织关系和工作都得到全部恢复;(该信最后写有“承仙嘱常问候,并告:她的组织和工作都平反了。”)而最让常老激动的是,历经“文革”十年磨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迎来了属于它的新的发展春天。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让已经74岁的常书鸿“老大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回想已被历史大潮卷去的“文革”十年,书鸿老人曾说:“10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是啊,这位为敦煌艺术奉献了自己最美青春年华的老人,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中的非人遭遇,实在让人无不叹息。1976年,随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中国10年的动乱终于结束。看着国家慢慢走上正轨,敦煌莫高窟的研究与保护走上正途,自己又可以为敦煌尽一份绵薄之力。常老相信,属于这个民族的春天已经到来,自己和敦煌莫高窟的未来一定会非常美好。想到那美好的愿景,此时的常书鸿多想与徐迟一起策马奔驰在祁连山下的茫茫戈壁,向着太阳去追寻他们心中共同的艺术殿堂。

最后,常书鸿在信中向徐迟谈到一件憾事:“关山月正在兰州,但我因这里的工作无法脱身,恨恨恨……”1978年9月,关山月与广东画家黎雄才、陈洞庭结束了在青海采风写生活动,在返程途中经停兰州。关山月本想与多年未见的老友在兰州一聚,但常书鸿因工作实在无法离开敦煌,想到老友如此之近但自己竟无法相见,常书鸿的内心相当失落。谈起这对画坛老友的友谊,还要追溯到1943年。那年中秋节前,关山月、李平夫妇与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人从成都出发,风尘仆仆、一路艰辛地来到边远的敦煌采风。他们由当时被誉为敦煌三大才子之一的县教育科长任子宜先生陪同,前往莫高窟。在那里,他们受到“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

会副主任常书鸿的热情接待。常书鸿不仅向关山月等人详细介绍了莫高窟的情况,而且还为了便于关山月一行的临摹,常书鸿将他们安排在皇庆寺住下并悉心关照。敦煌莫高窟那色彩斑斓、千姿百态、造型生动的壁画与佛像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关山月。每天清晨,关山月与常书鸿一道前往莫高窟。当时临摹条件非常艰苦,莫高窟坐西朝东,洞窟里只有上午光线比较好,下午到了三四点钟后便一片漆黑。因此,每天关山月早早就带着画具进洞窟,靠着妻子李平手举暗淡的油灯,艰难地进行临摹。对于那段岁月,关山月在后来《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一书的自序中曾深情回忆道:“我不计较什么是艰苦、什么是疲劳。那里确实很荒凉,幸而我有妻子的协助,由她提着微暗的油灯陪着我爬黑洞,整天在崎岖不平的黑洞里转。渴了就饮点煮过的祁连山流下来的雪水,明知会泻肚子也得喝下去;饿了就吃点备用的土干粮,就这样在黑洞里爬上又爬下,转来又转去,一旦从灯光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画面,我们就高兴地一同欣赏,分析研究其不同的风格、造型规律和表现手法。由于条件所限,只能挑选喜欢的局部来临摹。有时想临的局部偏偏位置较高,就得搬石块来垫脚;若在低处,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来画。就这样整个白天在洞里活动,晚上回到卧室还得修补补。转瞬间一个月的时光过去了,用我和妻子的不少汗水,换来了这批心爱的临摹。